

王安石变法

漆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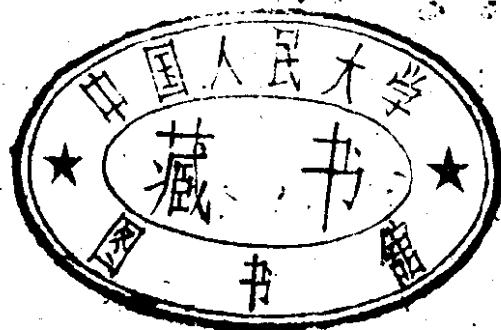


11.3413./9

468297

王安石变法

漆 俠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王安石变法

漆 俠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 公厘 1/32 印张8 1/4 字数186,000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11074·247

定 价：(十一) 1.05 元

封面设计：赵 晴

对资产阶级历史学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研究 种种谬论的批判(代绪论)

以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間(1068—1085年)进行的政治改革,不仅是宋代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之一。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政治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間辩证关系等基本原埋,考察一下这个重大事件,可以知道:它是历史的一个产物;它是阶级矛盾(主要的矛盾)和民族矛盾(次要的矛盾)交错发展下的一个产物;它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具有进步性质的变法派和代表反动势力的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的产物。同时还知道:这次改革不仅对宋封建专制統治起了巩固和加强的作用,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的作用。

多少年来,王安石变法就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剥削阶级学者的研究并没有能够抉发这个事件的真相,更没有能够抉发这个矛盾运动过程的规律,从而亦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和科学的结论。固然由于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有关变法改革活动的实际材料,遭到以司馬光为首的顽固派以及同顽固派声气相通的封建文人的无耻窜改,从而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不小的困难,使人们难于洞察事实的真相。但问题的关键却在于:正是由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学者的剥削阶级偏见,以及他们的唯心论观点和形而上学方法的不中用,这就决定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而且还给这个问题附加上更多的歪曲。为了使

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入科学的领域，就必须对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历史学中有关这个问题的种种荒谬论点，首先加以揭露和批判。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王安石主持下的变法改革，在受到抑制的大地主集团心目中，不仅视为“祸国殃民(?)”、漆黑一团的事件而加以诬蔑，而且王安石本人，也被当作地主阶级的叛逆而遭到恶毒的攻击。只要看一下南宋年间撰写成功的话本拗相公，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猪犬不如的人，那就知道，他们的恶毒影响传播得多么广泛了。对于横施于变法改革和王安石的各种诬蔑，是应当予以清除的，问题在于从什么角度和怎样予以清除。封建主义学者的研究局限于这个方面，而且是从不正确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观点上来对待那些诬蔑的。

从南宋以来，如陆九渊等人就有这种观点，即：从根本上否定这次变法，并认为王安石蔽于所学而为“小人”(指变法派分子)利用，但王安石自己则是节操洁白、“英特迈往”的人物①。这种只是从封建伦理道德上分别“邪”“正”、“君子”“小人”的观点，仅仅把王安石个人提到同他们所谓“元祐君子”“分庭抗礼”的地位，根本不能说明这个事件的真象。

上述这一观点蒙蔽了许多人的头脑。清人蔡上翔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于陆九渊等人，即他肯定了变法，亦肯定了王安石本人，但在实质上则和陆九渊的观点并无丝毫不同之处。蔡上翔穷多年之力，撰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今天所能接触到的材料，已经远远超过该书所援用的范围，但是他的这个著作，对王安石变法问题的研究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不过，牢实地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蔡上翔，他编纂王安石的年谱，旨在为王安石申冤辨诬，他的肯

定变法的成效，以及对司馬光集团的指責，乃至对王安石生活細節的煩瑣无聊的考証，都是圍繞这个主题面来的。通过这种申冤辨誣，他把宋神宗和王安石描繪成为圣君賢相，并把王安石說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偉人。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封建主义的歌功頌德。象这样一个持有濃厚階級偏見的人，当然不可能对王安石变法及王安石本人有真正的了解和正确的認識。

近几十年来，資产階級学者（其中包括外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亦做了一些工作。他們摆脱了封建主义的一些局限，搜集了較多的材料，提出并叙述了若干有关王安石变法中个别的和局部的事实問題，写出許多文章。他們比封建主义的学者的研究迈进了一步。但是，他們的研究，充其量仅是对于若干孤立現象的說明。就是在这个方面，他們做的亦并不充分。資产階級学者常以征引大量材料而自相炫耀，仿佛只有他們才重視材料。事实上，他們对于历史材料并没有进行严格的批判和审查，很多論文和著作整段整节地抄录了历史材料，至于材料的涵意和内容是什么，他們并未給以解說。他們虽然提出了变法改革的渊源、变法改革的性質以及变法斗争的根源等重要的關鍵性的問題，但是由于他們的反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只是随意地上下古今比附在一起，瞎說一通，絲毫无助于問題的解决。这种瞎說乱道固然显露了資产階級历史学的反科学性，但这还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們用这类謬論閉塞人們的耳目，从而为反动的統治階級服务。只要看一下他們从王安石变法中，給蔣介石国民党法西斯統治下的保甲法找到历史的“根据”，从而为这个反动透頂、充滿血腥的保甲制度进行辯护，那就可以知道，他們歪曲历史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了。因之，清除这些历史的垃圾，是一件多么庄严的事！基于此，下面

便着重地把具有代表性的和影响較大的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胡适和錢穆的說法加以駁斥。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历史学中到底有什么貨色。

首先看一下胡适有些什么貨色。

在記李觀的学說一文中^②，胡适试图說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渊源。胡适說：李觀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是王安石的先导”。在这“大胆的假設”后面，胡适“小心求証”了一番，于是以李觀、王安石都講周礼和同为江南西路人这两个理由，便“証实”了王安石变法渊源于李觀。你看胡适是多么容易地“解决”了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地主阶级内部經過多年酝酿而出現的王安石变法这个复杂的问题！胡适又是多么严重地夸大李觀个人的作用！

能否因李觀、王安石都談周礼就說王安石变法源自李觀？不能。周礼作为古代思想資料之一可以供他們摄取，这固然有助于他們的政治观点的形成，但他們的政治观点之真正形成則取决于复杂的社会条件。虽然他們同属于地主阶级，其思想实质亦都是封建主义的，然而他們各自所处条件如生活实践等的差别，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思想观点。所以，尽管李觀、王安石同講周礼，但在对待豪强兼并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上，李觀带有濃厚的妥协的色彩，而王安石則采取抑制的态度，这正是同抱着改良愿望的李觀和王安石重要分歧之处。显而易见，胡适的第一个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至于胡适的第二个理由，那就更为肤淺可笑了。胡适还把另一个江西人欧阳修拉出来，有意讓他充当媒婆的角色，将李觀、王安石撮合起来。这是因为欧阳修也主張过改革，他們同为江西人，都具有先进的气味，所以王安石变法就会来自李觀。只要胡适稍微有点宋史的常識，他就該知道这一事实：在庆曆年間范仲

淹主持改革之日，欧阳修并未因范仲淹不是江西人而不予帮助；在熙宁年間王安石变法之时，欧阳修亦并未因王安石是江西人就不加反对。胡适这一着不过是替自己打几記耳光，并没有带来别的什么。

胡适常常吹嘘他的历史方法是“科学方法”，“明变求因”就是他的重要“科学方法”。上面的实际例証，証明了他的“科学方法”的虛妄。同其他的资产阶级学者一样，胡适慣于把事物的表面的、偶然的、没有任何本质联系的现象，硬是掇連在一起，妄图說明事物的“变”和“因”的关系。这种做法自然是徒劳的。黑格尔用譏笑、輕蔑的口吻說：“历史上常有人搜集了許多奇聞軼事当做大事件的小‘原因’，——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导因，只是一种外部刺激，《事件的内在精神完全可以不需要它》。”^⑤ 胡适“小心求証”来的那两个理由，比黑格尔早已譏笑过的那些“小‘原因’”并不高明；这样地来証明王安石新法的渊源所自，只能說明胡适的历史学的破产。

另一个资产阶级学者錢穆提出南北地域之說来解釋变法派同反对派斗争的原因和实质^④。錢穆首先把“新法之招人反对”归結为“新旧思想的冲突”；繼而把这种“新旧思想之冲突”归結到“南北地域的区分上”；而“南北地域的区分”則在于“地形、气候、物产”的不同。非常明显，錢穆之說是从胡适上一說法引申、推論来的。所不同的是，錢穆以为“新旧思想”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南北“地形、气候、物产”的不同；另外錢穆更从历史上、新法实施中找到若干“例証”來說明这个冲突根源于南北地域上。錢穆的这个說法是有其市場的，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这个說法改头換面，加以傳播。

首先應該說明这一点：在封建經濟制度下，即使政治上形成統一的局面，但还保持一定程度的割据状态。在这情况下，往往是不

同地域的士大夫，通过同乡、亲戚和朋友等一系列的封建关系，形成不同的集团，为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发生冲突和斗争。从形式上看，这类政治集团是不同地域的产物，而在实质上，则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这是錢穆根本不能够明白的。因此，在考察历史上象魏、晋六朝年間一些政治集团的斗争时，应该考虑到地域的因素，但这同錢穆提出来的地域之說并无分毫共通之处。至于熙宁变法中的斗争，是否决定于地域，是否决定于錢穆提出来的南北地域？事实証明，并不这样。

錢穆从宋初历史上为他的南北地域之說啄覓根据。根据之一是：錢穆虽也承認宋室“不相南人”的“教戒”是一不可靠的傳聞，但接着却說“宋初南方人不为相則系事实”，由此証明北人对南人的排斥“由来久矣”。如果看一下这个事实，即赵匡胤自中原起家，开国之初的显貴人物自然来自中原地区，那就应该承認，“宋初南方人不为相”这一“事实”，无任何奇怪之处！因而这当中并不意味着北人对南人的排斥。根据之二是：錢穆引証了筆記中的材料，称王欽若（南人）因受王旦（北人）的排挤，使其任宰相推迟了十年；又寇準称晏殊为“外江人”，由此来証明北人对南人的排斥。实际上，这类材料只能証明，他們在地域的外衣下进行着爭权夺利的斗争，而这类斗争，如果錢穆愿意引証的話，那在北人当中不但更多而且傾軋得更为厉害。由此可見，錢穆在宋初历史上啄出来的“根据”是站不住脚的。

錢穆一再強調“在朝风节之振厉”、“朋党之起”、“文章之盛”等等，乃是由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南士提倡形成的。由此証明南士有“开新与激进的气味”，并由此証明王安石变法是这个“气味”的延續。錢穆夸大个人的作用是极为明显的，不必多談。但这些“証据”对南北地域之說究竟有无用处？如前所指，錢穆把南北“新

旧思想”的产生归结于南北地域的“地形、气候、物产”的不同上。按照錢穆的說法，随母改嫁自幼来到山东的范仲淹，是在北方的“地形、气候、物产”条件下长大的，他的“开新与激进的气味”从哪里来的？錢穆在这里不是碰壁了么？就算范仲淹的这个气味来自南方，那么，在庆曆党爭中，支持范仲淹、欧阳修的象尹洙、韓琦、富弼、杜衍、石介、王质都是北人。这些士大夫不正是破除了地域的界限而結合成为一个集团了么？显而易见，錢穆挖掘出来这个証据并没有使他得到更多的用处。至于錢穆所說变法斗爭中，“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則大率是北方人”，试图用“大率”的字样磨开这个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要看一下庆曆、嘉祐之世，地主士大夫不分南北地域要求改革的情况，以及变法过程中两派当中都有南人和北人，那就可以清楚知道，錢穆的說法，仅是建立在表象上的、无本质联系的事实基础上的主观虚构。

同他在“大率”的字样下找得的事实“根据”一样，錢穆又在新法的实施中找得个别例証，称“王安石新法有些似在南方人特見有利，而在北方人或特見为有害”，由此証明其南北地域說。錢穆抓住罗从彦的“东南人实利之”一句話，就如此武断地說：“当时东南之役，諒必較重于北方”。錢穆引用了韓琦家傳中西川四路“大姓”反对青苗法的記載，就武断地說青苗法对北方特見有害。只要看一下差役法在全国範圍内引起来的灾害，錢穆的“諒必”这类臆断的字样就破产了；只要看一下各地“大姓”的高利貸猖獗的状况，那就知道青苗法不仅仅对北方“大姓”特見有害；特别是看一看王安石科举考試法中照顧北方士大夫的固定名額的办法，更能知道，这次改革是南北士大夫間的冲突之說是多么无稽了。

在任何形式的政治斗爭中，对立着的阶级或政治集团，在思想的領域中也是对立着的。而这种对立的~~思想~~亦就深刻地打上了它

所从属着的对立阶级和政治集团的烙印。判断对立着的思想观点的分歧，新或旧，落后或进步，反动或革命，首先要判断这种对立着的思想代表和维护哪个阶级、哪个集团的利益。自然条件如“地形、气候、物产”等（也就是地理环境），给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起决定性的影响，根本不能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资产阶级学者不能亦不可能懂得这些道理，他们总是无法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分清主要、次要的现象，仅仅“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⑥这一点上。胡适是这样，钱穆亦是这样。钱穆的国史大纲完全立足于这种唯心论的基础上，以片断的材料歪曲地解释了我们历史的发展。在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上，他仍然是用什么新旧思想之类的虚无缥缈的言词，以及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个别、少数例证，乱说一通。新旧思想的实际内容是什么，钱穆自己也说不出来。问题既然无法磨开不管，钱穆不得不把这种新旧思想或者说这种心理状态上的东西，归结到南北地域上，归结到南北地域的“地形、气候、物产”的不同上。钱穆在这个问题上比胡适的花样虽多了一点，但依然陷于唯心论泥潭中。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梁启超是怎样来写王安石评传这本书的。

梁启超最先把王安石作为历史上的政治家而加以研究，尽管他的这个著作材料很不充实，但他首先冲开封建主义史学的局限，给王安石变法以多方面的说明，因之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是有其开创之功的。不过，这本书的观点和方法，亦同样地贯穿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亦同样证明了资产阶级学者在历史研究中的反科学性。

梁启超以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考察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便完全混淆了历史时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

起，給以不倫不類的解釋。梁啟超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把按等第征收役錢的免役法說成“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⑥，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⑦，——一言以蔽之，“今世歐洲諸國，其所設施，往往與荆公不謀同符”^⑧。梁啟超不僅拿新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措施比附，同奴隸制下的希臘、羅馬比附，甚至還同社會主義比附！這種胡亂的歷史類比，無非是想利用塗在新法外殼上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為資本主義的“永恆”存在多找到一個根據。但這只能證明，資產階級學者在確定變法的性質上毫無能力而已。

梁啟超承認自己對王安石的“崇拜”^⑨。因之，在他的筆下，變法就成為王安石個人意志活動的結果。他對王安石變法誇大到這種地步，以至將免役法估價為“實國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⑩。不能不指出，梁啟超誇大王安石變法的這個動因，就是用“借尸還魂”的手法，把王安石變法和他曾經參加過的“戊戌變法”比附在一起，而為滾出了歷史舞台的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即大地主資產階級裝飾門面。這就不能不暴露了他的吹噓改良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革命這一面貌和實質。因此，儘管梁啟超說什麼“史家之職，不容阿其所好”，應當“熟考當時之情實”，“平心以論之”^⑪，但在這種客觀主義詞句的背后，卻隱伏着主觀唯心主義的隨意亂來。

正是由於梁啟超把這個複雜的歷史事件看作為個人意志活動的結果，亦就使其在若干方面重蹈封建主義學者的謬誤，以抽象的倫理道德觀念，論斷是非，以至成為變法派的辯護師。過去稱變法派都是“小人”，梁啟超花費很多筆墨，寫成“用人和交友”一章，證明其不盡為小人；過去稱反對派為“君子”，梁啟超便說不盡為“君子”。在這類徒勞無益的著述中，梁啟超的思想方法，拙劣可笑到這般地步：他根據有關程顥、劉彝、盧秉的個人行誼的記載，而推論

到謝卿材、侯叔獻、王汝翼、曾伉、王廣廉五人的作為，說：“宋史皆無傳，事迹不可考，以程、劉、盧等三人例之，當皆佳士也。”^⑫個人行為的好壞與否亦都能從別人行為好壞推論出來，資產階級歷史學方法萬能到什麼程度了。

陷於封建道德觀念泥淖中的梁啟超，亦就根本無法分辨是非。他看到變法派中不盡為“小人”，而亦有“君子”，反對派不盡為“君子”，亦有“小人”，因之兩派鬥爭的是非，就使梁啟超處於無法解決的矛盾中，最後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來：“彼私黨者，不必為小人也，而君子亦多有焉。其目的不必以求祿位也，而以辭祿位為目的者亦有焉。所爭者不必為政治問題也，然無論從何種問題發端，而其葛藤恒牽及政治。……一言以蔽之，曰意氣用事而已。……察此性質，則當時新法所以被阻撓被破壞之故，從可識矣。”^⑬梁啟超把變法派和反變法派間具有原則性的政治鬥爭，看作為“意氣用事”的無原則糾紛，而且把新法的被破壞亦看作為由“意氣用事”而促成，這對問題的實質歪曲到什麼地步！

梁啟超不但對變法鬥爭做了歪曲的說明，而且對變法實施的具體狀況亦做了歪曲的解釋。他將變法實施之有無成效，歸結於國家疆域的大小這一原因上：“荆公同操此術，而又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出之，而效不大觀何也？殊不思三代以前之政治家，其所經畫者，千里之王畿耳，否則數百里之侯封耳！今世歐洲諸國，其大國不過比吾一二省，其小者乃比吾一二縣也。故以三代以前行之而有效者，今世歐洲各國行之而有效者，荆公宰鄞時行之，其收效能與彼相等，是敢斷言。及夫宰天下行之，其收效能與彼相等，是不敢斷言也。”^⑭梁啟超既無法了解變法的性質和變法鬥爭的真實狀況，因此他也就不能估計新法的成效。梁啟超上面的話中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他的邏輯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只有小國才能管

理得好，而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家是无法管理好的。这个非常可怪的論調，乃是完全丧失民族自豪感的、日趋沒落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

除此以外，梁启超在談到变法背景的同时，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还作了这样的描繪：“是故疇昔治大国者，惟有二法焉：一曰威劫，二曰放任。……我国数千年之历史，凡一姓之兴，必以威劫为政策，如汉高祖、宋艺祖之时代是也。及經数叶，則必以放任为政策，如汉文、景、宋真、仁之时代是也。放任既久則有乱，乱則有亡，亡則有兴，有兴則有威劫，威劫既倦則返于放任，如是迭为循环，若一邱之貉焉。”^⑤几千年的内容无限丰富的历史，就被梁启超縮写到威劫—放任这样一个简单重复的循环論公式中了。这是对历史的一个多大的歪曲！梁启超持有这种循环論的濫調是很自然的。以个别英雄偉人、圣君賢相为历史中心的观点，就只能从这些人物的意志强弱来解釋历史，必然得出威劫（在梁启超看来这是个人意志强的反映）—放任（个人意志弱的反映）这个循环論的公式来。所以，尽管梁启超后来羞羞怯怯地提出了因果論，由于他无法跳出“威劫—放任”这个圈子，他的因果关系論就同胡适所叫嚷的“明变求因”的因果論无任何本质的差别，都是以外部的、偶然的、无本质联系的现象作为其因果論的事实基础的。

梁启超、胡适、錢穆在政治上是有某些区别的，但在学术思想上則同属于資產階級思想体系。他們以各色各样的唯心論观点和方法，歪曲了历史，也歪曲了王安石变法。尽管資產階級的历史学观点方法是多么反科学和多么不中用；它們却竭力表现自己，妄图同真理、科学对抗。在馬克思主义取得偉大胜利的今天，妄图使資產階級社会学在社会主义中国复辟的一小撮蚍蜉，叫嚷什么“馬克

“馬克思主义过时了”、“馬克思主义停滯了”，适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系統地批判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揭露它的反科学的面貌和本質，对我國社会主义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这个小册子在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学者有关王安石变法研究种种謬論的同时，將试图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事实材料中說明王安石变法这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它不仅答复为資產階級学者提出的但却被他們歪曲解釋了的若干关键問題，而且亦將提出一些新的問題来，和史学界同志共同研究，使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我們認為，王安石变法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愈能清除資產階級历史学所給予的歪曲，愈能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揭示其原来的面貌，就愈能使人們从这个事件的規律性发展中，吸取历史的經驗教訓，从而为今服务。悬示研究王安石变法这样一个方向和目标，是一个庄严的任务，愿和史学界同志共同完成。

此外，書中附录了王安石新法部分的校勘資料，以供同志們参考。

-
- ① 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九，荆国王文公祠堂記。又朱熹也有类同的观点，他很推崇陆九渊的这篇文章，并且也多次提到王安石蔽于所学，可参閱朱子語类卷一三〇的記載。
 - ② 胡适文存二集第一卷，第43—73頁。
 - ③ 轉引自列宁：哲学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2頁。关于黑格尔所說的“内在精神”，列宁在同書第143頁中曾經指出，“是唯心主义和神祕主义的东西”。
 - ④ 見錢穆：国史大綱，商务印書館版，第414—420頁。
 - ⑤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載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20 頁。

⑥⑦⑧ 分見梁啟超:王安石評傳,世界書局版,第 60、73、45 頁。

⑨⑩⑪ 分見同上書,第 61、44 頁。

⑫ 同上書,第 121 頁。

⑬ 同上書,第 104—105 頁。

⑭ 同上書,第 45 頁。

⑮ 同上書,第 46 頁。

目 录

对资产阶级历史学中有关王安石变法研究种种谬论

的批判(代緒論)..... 1

第一章 宋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

(960—1069年).....14

一 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系。积贫积弱

局势的形成.....14

二 封建土地所有制变化下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封建国家

和地主的關係.....27

三 沉重赋役剥削下的农民阶级状况。阶级斗争

的尖锐化.....40

第二章 封建统治危机下改革要求的酝酿及其成熟

(1043—1069年).....53

一 封建士大夫改革声浪的扩展。个别的、局部的改革

之不断涌现.....53

二 王安石执政前政治思想的发展状况.....65

三 改革条件的成熟。宋神宗坚决变法.....77

第三章 变法的内容和实质

(1069—1085年).....83

一 对官僚机构的调整和下层士大夫的提拔。科举

制和学校制的变更.....83

二 军队的整顿及其战斗力的加强。巩固地方封建

秩序的保甲法的建立.....95